

——李鸿章传

洋务之梦

主编 \ 成晓军
◎
\ 著 隗瀛涛



“强国之梦”系列丛书

四川人民出版社

“强国之梦”系列丛书

洋务之梦—— 李鸿章传

主编/ 隗瀛涛 © 成晓军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孙旭军

封面设计:任兆祥

插图:任兆祥

“强国之梦”系列丛书

隗瀛涛 主编

洋务之梦——李鸿章传

成晓军 著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址: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编:610012

经销:新华书店

照排: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川电脑印务中心

印刷:绵竹教育印刷厂

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28)6660527 6666009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插页:5

字数:255千 印数:10001—30000册

版次:1995年7月第1版 印次:1995年8月第2次

ISBN7-220-02862-8/K·412

全套共10册,总定价142元(每册14.20元)

总 序

DJ56/12

隗瀛涛

我们正处在一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建成世界强国，这是当代中国人执着追求的理想。

宏伟的现代化事业，需要人们脚踏实地立足于现实，也要高瞻远瞩于未来，还要回头看看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曾经是一个强国，但近代中国不是。近代中国人不甘落后，致力变弱为强。一代又一代人探索奋斗，百折不回，辛辛苦苦，觅觅寻寻，追求强国之路。这条路，坎坷不平，荆棘地，有诗的意境，梦的虚幻。留下的是：发人深省的经验，令人振奋的目标，中国人的自尊与自信以及一颗颗滴着血的爱国心。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向古代告别，蹒跚地走向近代。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一步步地陷入了屈从于世界列

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之中。外祸日亟，国贫民困，亡国大祸迫在眉睫之间。要么是封闭窒息，丧失生存权利，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奴隶；要么是走向世界，挣脱侵略者的锁链，使国家独立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二者必择其一。

中国人选择了后者。正如孙中山所说：“方今列强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兴中会宣言》）在近代史上，各种反帝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各阶级、阶层、集团提出过不同的救国方案，探求过各种不同的救国道路。“殊途同归，在历史的画卷上凸现出了整个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主题：救亡图存。

救亡图存只能靠自己去奋斗：“苟我发愤自雄，西人将见好于我不暇，遑敢图我。”（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

自强之路在何方？为了寻求这条道路，中国人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先驱者们为了寻找救国真理，开始了急切而勇敢、曲折又坚毅的学习探索的进程。千秋功罪，自待后人评说。

那时，中国面临的世界是：“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为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世界的大势，为“不想灭亡”的中国人，规定了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向。

那时的中国，清政府已腐败不堪。它所提倡的汉学与宋学也完全脱离实际，空疏僵化，中国人已不能靠祖宗成法去抵抗外国侵略，保持独立自主了。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人要救亡图存，除了去向自己的对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外，实在没有其它路可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近代仁人志士们坚定的信念。

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斗争中，产生了新的政治、经济力量 and 新的文化形态。中国新的文化形态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的土壤上自发生长的意识形态。它是外国侵略造成中国封建经济结构逐渐解体 and 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而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和反应，引进和拒绝，吸收和融合，经过“师夷之长技”与“用夏变夷”之争；“中体西用”与“大兴西学”之争；科举与学校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打倒孔家店”与保存“国粹”、“国故”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近代新文化逐渐战胜与取代了封建的旧文化。近代新文化是一种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文化。尽管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弱点，但它作为新的文化形态 and 新的精神力量与救亡图存相联系，给中国近代社会以新的导向，注入新的活力。通过它的一批杰出代表，对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与革命运动起着先导作用与指导作用。

林则徐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魏源发挥林则徐的思

想，在《海国图志》中首先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见解。这个见解包含有辩证法思想：“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能否“制夷”，关键在于是否“善师四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海国图志》）“师夷之长技”主要限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及养兵练兵之法，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救亡图存的方案。它的历史作用在于开始打破深闭固拒的传统，为中国人提出了睁眼看世界的新视角与新的参照系。

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实践林则徐、魏源的方案，“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举办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洋务运动（或称自强运动）凡30余年。洋务运动以“强兵”为重点，也在“富国”上大做文章。凡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水陆交通、电报电话、新式学堂、译西书、讲西学、派遣留学生皆次第举办。尽管主持者李鸿章等人在镇压人民、屈服列强等方面大节有亏，但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新经济、新文化所起的倡导与推动作用，确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洋务派也曾极力将学习西方局限于“中体西用”的范围内，但不可能阻挡中国人日渐深化的学习西方潮流，反而启动了近代中国开放、变革的车轮。

张之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代表人物。但“中体西用”说并非张之洞发明的。这个词的确切提出是甲午战争以后，但“中体西用”思想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薛福成的《筹洋刍议》中已提出了这种思想。至八九十年代，此说日益明朗。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西学》篇中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张之洞讲“中体西用”，始于1898年，原文是“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7卷第22

页)同年,他在《劝学篇》中又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历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所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可见,“中体西用”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语,一种救亡图存的“至言”,是半个世纪以来,有识之士的共识共行的“至言”。

“中体西用”作为一个文化模式,反映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戊戌变法之前的一种居于主流的文化心态,即在中西文化交流问题上的矛盾;既不放弃中学,又不排斥西学,保护中学,将西学作为维护封建体制的添加剂。反映了文化开放初级阶段的特点,显示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艰难与曲折。

“唤起中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戊戌变法》一,第296页)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创巨痛深,激起了救亡图存的新高潮。此时,中西文明对比的反差更为明显,中国贫弱落后的状况暴露无遗。严复说:“彼乘骐驎,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救亡决论》)人们从重创了中国人的日本的强盛发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东方的威力、近代化的胜利。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独领风骚,决心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全方位地而不是枝节地学习西方,用西方的思想、技术、制度、文化,改良强国。他们大声疾呼“优胜劣败”,力主中国应该“尽革旧俗,一意维新”,“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为人们指出了一条维新改革、救国强国之路,掀起了戊戌维新运动、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维新派反对急骤的变革,以逐步改良的方式谋求社会进

步，反映了刚由封建士大夫脱胎而来的改革家们的理想。

孙中山表现了与旧体制决裂的非凡勇气和才能。他坚持革命进化论，举民主革命大旗于禹域。他认为救亡图存首在武装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向西方追求真理，但坚持独立自主，为我所用，促使中国富强昌盛进而突驾欧美日本之上。他不仅要进行政治革命而且要进行社会革命，声言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既领导与团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联络与运用会党和新军。为中国革命事业百折不回，一往无前，愈挫愈奋，终于领导人民推翻了清朝，赶跑了皇帝，并给中国的建设描绘了许多绚丽的蓝图，寄托着无限希望。

孙中山将学习西方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开始了中国人向西方追求救国真理的新阶段。他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选择向西方学习的内容。批判中国封建文化又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宣传西方文明的进步又揭发西方社会的矛盾，不让西方的痼疾再现于中国。孙中山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之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中国革命史》）正是这种批判的继承，选择的吸收，独立的思考，创造了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理论基础的三民主义。在孙中山以前，还没有任何中国人提出过像三民主义那样较完整、自成体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 and 纲领。

孙中山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思想，从不满足于革命事业的初步成果，从不讳言革命的挫折与失败，总是不断吸收经验教训，再接再厉，奋斗到底。他在晚年更以“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一贯精神，坚持与中国

共产党合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无愧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只可惜，他没有亲眼看到独立、富强新中国的出现，而不无遗憾地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历史已经说明，在旧中国只有反帝反封建革命才能救国。但是，能不能说除了革命之外，其他所有的救国主张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不爱国的呢？不能！以救亡图存这一历史主题而论，除了坚持革命救国的民主革命者外，某些统治者为自强而做的某些有利于国家进步的改革（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有关作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维新，还有一些爱国人士追求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主张和实践，我们都应给以重视。

有一些爱国志士真诚地，甚至呕心沥血、历尽艰辛地兴办教育，阐扬文化，开办实业，提倡科学事业，旨在救国强国。虽然，在旧中国不可能真正达到此目的。但是，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办教育，阐扬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兴办科学事业，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是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所必需的，是爱国的、进步的。

张謇本是天子门生、翰苑清品。但他却视官爵如过眼云烟，在洋货横流、利权外溢、民益贫、国益病之际，以全部精力创办新式实业与教育，与列强进行商战，锲而不舍，鞠躬尽瘁。他从1895年起状元办厂，陆续创办起包括农、工、商、运输、银行行的“南通实业”体系，不仅开拓了他的家乡南通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亦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项盛举。直至今日，人们谈及中国纺织工业时仍然念念不忘张謇。

在中国近代的杰出人物中，由清朝的翰林院编修变为著名

的革命党人，以民国教育总长的高位而留学西欧，长北京大学而支持学生运动，除蔡元培外，再无第二人。蔡元培比他同辈的任何人更重视教育事业，着意培养新式人才，提高国民素质。从1902年成立中国教育会为开端，他毕生与教育事业相始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揭橥的办学方针。这一方针改造了北京大学，提高了北京大学，使北大成了五四运动的摇篮。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科学精神、长者风度，给我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是名副其实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张元济别具光辉。他早年以翰林参加戊戌维新运动之后，以“戊戌政变子遗”投身文化教育事业，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在出版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了许多突出贡献。他主持“商务”时期，不但出版了大量教科书，而且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古今中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创办了多种综合性和专门杂志。他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中主张：“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他认为保存祖国传统文化是“事关国脉，士与有责”。其思想境界与历史责任感不可与专心射利发财为目的的书商同日而语，更不可与哗众取宠、粗制滥造、毒害人群的奸商同日而语。

胡适一生讴歌西洋文明，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是，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应该没有争论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同仁一样，胡适的动机和目的是要从他们认为是最根本的文化上制造中国不亡的远因，即为中国“再造文明”，以达到中国在上世界上各方面都不落后于人。实际是要复兴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这就是胡适将他所参与并认同的运动命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深意。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何

尝不是从文化上探索强国之路呢？正是这共同的梦想，共同的努力方向，与本丛书所列入的诸人物一线相连，貌殊途而实同归。

胡适所说全盘西化，在当时有反封建文化的意义。其实，他的本意还在“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建立一种“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他说过：“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他作诤臣、作诤友。”（《致陶希圣信稿》）胡适是一个提倡“尝试”和“努力”的实验主义者。他一心把中国引上美英的发展模式。这终究是一场美梦。但他在近代中国强国之路上留下了独特而永久的历史痕迹则是其批判者与拥戴者都能接受的看法。

胡适曾经对封建文化进行过大力批判，看到了吸收西方文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主张“用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化，使它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相协调，并继续发展。”（《先秦名学史》）当然，我们在肯定他对封建学者批判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应否定他过分的美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否定西方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共产主义文化的误区。

救亡图存的旗帜召唤与培育了近代无数英杰。他们或以革命救国，或以改良图存，或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或以“再造文化”救国，林林总总，其共同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改造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进步与局限。他们都在特定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活剧，有声有色地使中国迈出了近代化的步伐。促进了近代中国新的应变力量和进步的驱动力量的生长，并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侵略与压迫的

倔劲和对自强之路的渴求。“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屈原：《九歌·国殇》）这是多么高尚而珍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它像一级级阶梯，由低级向高级上升。它的发展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那些从下而上，不畏艰险，攀登历史阶梯的人们中，有的并非是身强体健，洁白无瑕者。但是，只要他们曾做过救亡图存的好事，我们就应该历史地承认。当然也不能忽视批评其错误乃至罪过。

本丛书共 10 位传主：林则徐、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张謇、张元济、胡适，看来是品类不齐，地位各异的。但有一个一致之点：他们都是各历史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都走过自强之路，做过自强之梦。我们不仅重在再现他们的思想与实践，尤重在发掘他们的经验与教训。我们把他们都看成近代历史的产物，他们不同的思想与实践，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救亡图存的选择与尝试，成功与失败的基本过程。对不同的历史人物，自应有不同的评价，但中国近代自救自强之路，却是由这些不同色调的历史人物探索的。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歧路也是历史遗产，因为没有歧路的挫折，又哪来正道的开拓呢？

近代仁人志士们走过了 80 年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以救亡图存之路。这是一条真实之路。他们的许多业迹是永载史册，很有启发借鉴意义的。他们是近代化的先驱者，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启蒙者，中国革命胜利和现代化建设的开路者。历史就是这样教训中国人的，只有用向资本主义学习失败的沉重代价才能换取社会主义光明前途的到来。

近代中国自强的根本问题是用革命推翻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取得民族独立，

人民民主。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或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或与封建主义含情脉脉。以致他们最多解决了某个局部，某个环节，或创造了促进解决的某些因素，却未能解决中国自强的根本问题。世界之大势，中国的国情，注定了中国自强的根本问题是不可能由他们来解决的。因而，从学习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到实行政治经济文化改良，再到革命共和，一浪被一浪所冲退，一次运动被另一次运动所否定，直到孙中山逝世之时，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依旧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历史证明：近代的改良与革命都没有解决中国的独立富强问题。真是路漫漫，夜漫漫，黑夜难明赤县天！

在这个根本要义上，近代中国仁人志士们的自强之路，就可以说成自强之梦了。梦是绚丽多采的：“师夷制夷”之梦，“中体西用”之梦，和平改良之梦，武装搏杀之梦，“再造文明”之梦……也许在梦中，他们曾看到一个富强的中国，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并因此而额手称庆，欢忭不已。但当他们被侵略者大炮的吼叫，中国民众啼饥号寒的呻吟惊醒时，所看到的仍是一幅幅血迹斑斑的图画。“中国的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5页）。他们不得不抚膺叹息：没能为中国找到自强之路！中国人必须去重新求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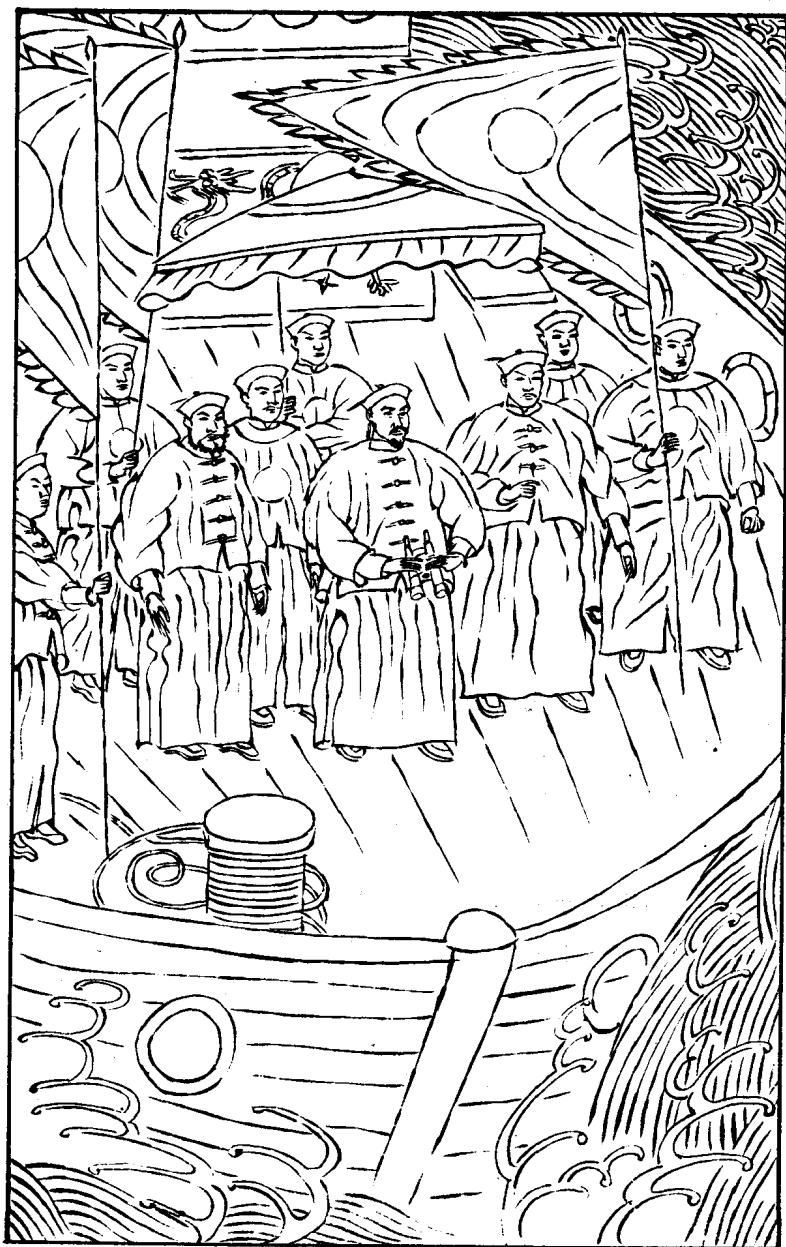
因此，本丛书将近代一些代表人物的强国奋斗称之为强国之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现实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再现和加工。美好的梦并不都是虚幻的。它往往给人以憧憬与追求，启示与力量。好梦成真，现在，我们不是踏着前人的足迹已经和正在把前人自强之梦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自强之路了吗？

本丛书是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学术著作。我们希望它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较好的社会效益，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提供有用的参考材料。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继承与创新，更需要百家争鸣，取长补短。将近代中国的著名人物，分别按人立传的著作已经不少，高论迭见。但将各代表人物有选择地串成一线，知人论世，从一个群体展示中国近代史的全局，我们还是尝试。由于我们学识所限，本丛书的缺点乃至错误势难避免，敬请专家和读者们指教。

本丛书是一项集体研究成果。作为主编，我衷心地感谢本丛书的副主编李殿元、孙旭军二同志，他们在策划、组织、审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衷心地感谢各传的撰写者：屈小强、成晓军、谢放、何一民、杨天宏、李殿元、张学君、马征、陈建民、罗志田诸同志操觚的辛劳与精诚的合作。并向倡导、支持本丛书写作与出版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领导邓星盈、蔡行端同志和综合编室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1995年4月于四川大学桃林书舍



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终于造出了近代中国第一艘大型的新式兵轮。曾国藩“亲自登上兵船，试行至采石矶”，并命名为“恬吉”，即“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的意思。